

中国当代文学资本化运作简论

钱旭初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当代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化多元化需求的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资源建设的“生产结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作家姿态、作品生产方式、思潮兴起或资源的形态,都集体向市场化转型,并且逐步开始了文学资本的运作,呈现出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泛化”;文学资源审美性的淡化乃至戏谑化;创作主体向生产者角色变化;以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消费的类型化与读者市场的分层、分类等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资源的产业化与资本运作化的合法化,使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追求和谐、平等、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构建“绿色、环保、低碳”的文学生产机制,营造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完善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或许才是在不可逆转的资本化过程中,当代文学十分重要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资源 文学资本 文艺政策

钱旭初,江苏开放大学教授 210036

在一般意义上讲,文学资源应该包括作家与批评家,作品及文学批评、文学思潮,刊物与出版社,学院及研究机构与文学学科、课程等元素。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资源建设,主要谈的就是作家的创作、出版社及其文学刊物的传播、评论家对于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评述、学院和研究机构通过文学课程的传授或专题研究而形成文学学科……但这个“资源”的主旨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作品;二是研究与评论。资源建设的内涵与外延有着约定俗成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传统文学资源的格局,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丰富、扩展。如作家身份的多重性(如郭敬明身兼作家、出版商、电影导演的角色;韩寒则作家、导演、赛车手兼于一身;严歌苓有作家与影视编剧双重身份;余秋雨既是作家又是文化活动家;于丹既是研究者又是媒体知识分子等),作品形态的多元性(由文学文本演变成其他表现形式,如将小说改编成连环画、动漫、游戏、影视、戏剧、舞蹈作品;同样,电影作品也能改编成文学作品;百家讲坛上的文学演讲稿亦可出版成为畅销书),职业出版人乃至影视公司、文化集团的介入、新媒体的加盟、公共空间的融入……当代文学资源变得丰富而繁杂。

如果说,建国以后我们在文艺政策上采用了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一体化”模式,在创作策略上采用严厉的“控制”机制,在营销方式上采用统治性的“计划”手段,使得整个当代文学构成处于单一、僵化、封闭的格局中,因而当代文学资源生产是封闭而有限度的。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

国当代文学从创作到出版,从传播、阅读、推广到资源再生产,其资源建设的“生产结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理念、生产模式、产出机制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逐步进入到了资本运作的阶段,这已经是不容否定的现实。这种现实存在不仅影响着当代文学资源的生产,而且同样影响着当代资源生产体系和学科发展。如何有效、合理地运作当代文学资本,成为发展、繁荣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

一、当代文学走向资本运作的政策背景

中国当代文学面貌生产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宏观的国家方针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我国基本国策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会议提出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1]。大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由此,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2]。

在基本国策的转型与引领下,各种相关文艺政策随之配套颁布。从倡导到具体指导,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强有力态势。

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关于颁布〈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推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1988年,文化部下发《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推行体制改革“双轨制”的措施;同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周晓风在他的著作《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中,对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文艺政策改革的进程,作了如下较为详尽的评述:“1988年9月6日,国务院批转了《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1988】62号),要求在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中逐步推行‘双轨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发【1988】62号文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因此,1989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就成为一个指导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走向繁荣的纲领性和里程碑式的文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艺政策调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文件还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正确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当前,一个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正在我国形成。政府对文化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和间接领导,运用市场机制来组织和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是提供精神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方式之一。’这些提法在过去有的是受批判的,有的则闻所未闻,今天则成为文艺市场现象的某种总结以及文艺发展倾向的某种倡导。”^[3]

之后,到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具体部署了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和加强内部管理的相关意见;199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对文化经济政策作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1997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第521页。

[3]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349页。

革”；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当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3年12月，国务院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为文化市场改革提供财税、资产、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配套；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2006年9月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体设计与战略目标的基本成型。201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2011年4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文化改革发展问题，再次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2012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要求；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又一次强调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重大命题；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制定，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完善文化的经济政策保障，引导各种文艺团体、文化单位、甚至作家、艺术家通过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到文艺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中，不断推动、丰富与繁荣文化资源的生产。

毫无疑问，在国家强有力的文化政策推动下，我们开始逐步营造完善的文化市场，这成为当代文学资源生产形态发生变化的政策保障和理论前提。正如周晓风所说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逐步取消文艺工作者的特权，开始引入市场机制来为文艺创作注入活力，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文艺作品开始具有了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文艺作品就相应地具有了商品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重性构成，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文艺机制的市场化。”^[1]在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中，在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当代作家们的面前，醒目地书写了“市场”、“商品”、“产业”等鲜红的字样，也从长期“包养”的蚕茧中痛苦地破茧、转型，逐渐培养出了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和产业意识。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极大地释放和满足了人们多样性的生活愿望。

二、当代文学资本化的文化动力

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推动当代文学资源生产快速市场化与产业化的文化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文艺生产部门管得太多、太细，统得过严、过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简单化、绝对化，忽略了文艺同时也属于第三产业的‘产业’属性，片面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忽略了文艺同时也为社会其他方面服务的职能，并且把文艺生产部门的公有制同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文艺事业相混淆。”^[2]因而，文化体制的改革，改变了传统封闭、僵化的文学创作市场，文艺创作从过去单纯满足政治意识形态需求，转向极大满足人民文化生活愿望为核心。

消费需求的高涨，是大众内在文化需求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活动的地位迅速提升，娱乐业飞速发展，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涌进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十分复杂、纠结的文化状态之中。市场经济的驱动，加速了人们对于金钱财富的追求，也加速了人们对于政治意识的冷漠和享乐主义的热衷。市场，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文艺创作更加贴近百姓大众的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多样化精神活动的需求，也使文艺创作更多受到市场的调节，更加灵活、多样，逐步走向产业化；另一方

[1]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2]胡惠林：《文化政策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面,在利润法则、快感刺激的商业气息中,更加剧了以市场销量、“眼球”经济作为衡量标准的单一评价方式,消费者需求成为重要的市场杠杆,反过来迫使创作者通过文学的资本化形式去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占据文化市场,去拥有社会资源的份额。

在至上而下的文艺政策和至下而上的消费文化两种力量左右下,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态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整体的当代文学,进入到一种蜕变与激荡相互交织的文化状态中。在这种蜕变中,我们看到了前30年长期沿袭的当代文学创作伦理开始消散,“一体化”计划式创作消弭了,“精英化”启蒙式创作也弥散了,传统文学的“批判性”、“干预性”、“人民性”等价值立场则逐渐与“娱乐”、“快感”、“享受”甚至“媚俗”的价值观互相溶解。无疑,催生这种变化的“催化剂”,是消费文化在影响甚至左右文艺市场的走向。

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彻底的“祛魅”,他们再也不是精神导师和文化精英,日趋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作家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色,知识权力同样受到市场的选择。作家主体地位和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在现代传媒和公共空间制造的“平台”和“杠杆”作用下,一部分文人下海、“触电”了;一部分作家成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与电视媒体知识分子;一部分文人被签约“包养”了^[1];包装文人、出版策划、文稿拍卖……资源生产的形态完全改变了。一部《废都》经过有效的商业策划,尚未上市就已掀起巨大狂潮,贾平凹因而成为当年最耀眼的文化明星。导致这种状态的根本动因就是当代文学进入到了市场化运作阶段,开始经受市场魔手的调遣。也正因为是这只“魔手”的调遣,当代文学的资源及资源建设模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起来。文艺市场的经济杠杆促使政府“断奶”、期刊改版,带来了出版转轨与畅销书生产模式的形成,带来了文学排行榜与多元的评奖机制出现,多种命名方式的文学代、群冠名与文坛思潮口号轮番登场……这些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新模式,在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2]、杨匡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3]、洪治纲的《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4]等著作中多有论述。

现代技术带来的新媒体技术,网络文学的兴起,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形态。

网络与现代传播业飞速发展,凝聚成网络平台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合力,现代科技与文学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数字技术、互联网普及,使文学(文化)信息的传播速度、覆盖面都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网络、大众传媒在市场化条件下,已经成为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有效文化平台和特殊公共文化空间,跨媒介产业经营的文学产业链日趋完善,越来越拥有强大的文化权力和影响力,传播媒介和文化创意结合,“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成为由资源向资本的重要枢纽、条件,推进了当代文学资源生产资本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时尚化、消费化、信息化甚至媚俗化倾向,时刻影响着文学生产。文学艺术开始“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商业驱动与大众参与性……大量网络文学和网络写手的出现,手机短信文学面世,文学艺术向广告、时装、家庭装修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是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形态”^[5]。

网络文学浪潮汹涌,从文学(写作)生产到作品营销(阅读),都已被网络平台纳入到产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内容、风格、选材都契合着读者市场的追求,“后宫”、“盗墓”、“穿越”、“玄幻”等新题材领域不断开掘。它不仅仅是一类创作类型的出现,更是一种新观念、姿态的出场,它从出场开始,就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2002年,笔者就曾指出:“网络文学的学术生态是依靠读者的阅读和广告商的广告来

[1]1993年,“周洪”(创作集体)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中国大陆第一份购买作家的合同;之后,汪国真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梁凤仪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朔与北京华艺出版社、《钟山》杂志和王安忆等一批作家都签订类似“承包”协议。

[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杨匡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4]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张炯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5]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维系的。……作品的‘点数’成为对作品市场效果的测试和统计。网络像一面双刃剑,既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以往给予作家的束缚,便于作家身心自由地创作;又在经济市场层面制约着作家的创作。作家只有适应大众的共同审美需求,才能赢得‘点数’,才能获得广告商的青睐和经济效益。……在网络文学中读者站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读者的阅读方式决定着作者的生存形态……当代文学产业化即将出现。”^[1]不仅如此,网络文学进军影视圈,已经成为当下影视创作重要的文学来源,不但丰富并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资源建设,更成为当代文学资本化运作的典型案例。

三、当代文学资本化运作的特点与表现形态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消费市场的形成,从根本上转变了文学资源生产的格局,也催生了文学资本的运作。资本化的文学以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

这种资本化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泛化”。

作为一种生产行为和生产方式,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资本积聚能力,已然不再单纯停留在“创作——阅读”的简单领域中了。这个场域空间早已放大,这其中的生产关系业已多元。文学场域关系中的市场经济因素已经超越政治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它多方位调整着文学的选题、故事、叙述和构成方式……特别是利用“创作后”的市场效应来进一步调控作家的创作、文学思潮的走向,甚至左右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形成有效的当代文学资源积聚与资本积累。

从产品(作品)出版、发行的动态看,当我们告别图书配发的计划经济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市场的调节与实践。作为一种产品,市场有权力、有能力将它调制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构成了文学市场中特殊的“场域”。当年的“雪米丽”创作现象、“布老虎”丛书现象、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现象、饶雪漫创作团队现象……都表明了创作后的市场运作与作品资源再度进行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作家的创作完成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衍生产品。最直接的行为,如小说诞生后,往往会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话剧、歌舞剧、广播剧等其他艺术形式。这显然是从作品(或称之为“文学产品”)的角度进行延伸、展开,依靠作品形成的文化影响力与文化权力而展开的深度资本开掘与运用,这种资本力量不仅触及到文学的周边艺术门类,甚至延伸到游戏、动漫、玩偶、雕塑、影像、旅游、公共空间(如作家纪念馆、文学馆)等领域,当代文学资源生产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这些既是当代文学重要的资源,也是当代文学文学性的扩散。

当代文学资本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眼球经济”,文学资源审美性的淡化乃至戏谑化。

从当代文学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看,文化产品从资源性走向资本性,是一个资本积累与再生产、再升值的过程。文化场域中,文化生产与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受到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在运作上又基本遵循文化消费、市场化的需求准则。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推动、制约、演化关系,脱离了单一政治一体化制约的窠臼。文学的祛魅,使往日神圣的革命教育的文本不再,精英式的传教的文本不再,“红色经典”的戏说成为消费时代“经典”的文学标本。

作为文学创作,它本质上属于特殊的生产形式,是作家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的产出,当这个过程越来越趋向市场化时,作家的创作就越来越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从文学资源到文学资本的形成,乃至文学资本的运作,侧重的是文学创作链的“后作品”现象。它的前提是作家、作品的市场成功,当作品一旦获得读者(市场)的认可甚至追捧,作品自身也就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效应,不仅给作者、出版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也获得了市场号召力,作家与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能力,作家和作品便成为具有文化符号的资本形态,在读者和消费者中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获得了有形的文化资本。这些在文化市场中形成的“消费魅力”、文化影响力,则构成了有形或无形的、实体的或象征性

[1]钱旭初:《大众化时代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的资本,再次以新的形态投入到文化市场中之后,便形成了新一轮文化“利润”的创造。因而在不断地与商业流通形成同构的过程中,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及文学性得到了扩散,在眼球经济的驱动下,文学资源符号化、图像化、玩偶化,文学叙事趋向审美的泛化、“轻”化,甚至出现了大量戏说类文本的“戏谑化”。

第三,创作主体向“生产者”角色变化。

当代作家从上世纪末以来,经过了政治“祛魅”和资本“护魅”的过程,如同炼狱一般重新脱胎换骨。政治上的祛魅,使他们往日的光环开始失去。尽管他们依然可以保持独立的、个体精神活动的身份与角色,但肯定的是,他不再是布道者、不再是施教者,甚至不再是启蒙者,而只是一个在文学场中使用文字的职场工作者,一个依靠写作而生存的社会角色。但当他的作品在文学市场中获得好评、成功之后,他在新场域中重新获得了精神护魅,从而也获得了文坛地位、文化话语权和文学(文化)资本。

作家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文学市场中特殊的“人格化产品”。他具有自我的能动力和被市场调节的从动性,因此,往往根据自己的位置、自己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和质量,根据自己所追求的利益而进行创作投资。这种姿态呈现出创作的自由,但也表现出批量、复制的无节制特征。但无论何种心态与目的,其运作方式已经完成了一种“资本化”的过程。随着这种“人格化产品”价值的提升,且这种价值往往突破了之前单一创作的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层面,约稿者蜂拥,采访者不断,出席各类讲座、庆典、嘉年华活动,利用各种媒体频频亮相,演讲、评说,推出更多作品(产品),甚至有更多的非文学项目开始运作。如张贤亮当年利用其文坛影响力,创办了中国西部的影视城;易中天利用他在百家讲坛上形成的名人效应,顺带畅销了过去甚至积压的专著;饶雪漫组成团队集体创作、宣传;郭敬明、韩寒跨界当导演拍电影……这些案例表明,作家们正在利用已经形成的市场影响,打造广告、“品牌”优势,运作文学资本,生产相关文学的延伸产品(如影视作品、影视城、图片、标识等),再度扩大自身文化容量,也获得了更多、更丰厚的回报,构成典型的资本运作模式。因此,从资本化的角度看,作家的身份已经职业化、偶像化和商业化。

第四,文学创作与文学消费的类型化与读者市场的分层、分类,也是文学资本运作的重要现象。不难发现,郭敬明、饶雪漫的创作面向着广大青年和学生;而莫言的创作则更趋向于满足知识分子读者;中产阶级白领喜欢《瑞丽》和《时尚》;文学青年喜欢《读者》……当“青春文学”以及盗墓、悬疑、职场、言情等“类型小说”出现之后,更加直接而深刻地表明了当代文学作家的创作,既有表现自身的情感特点和社会体验的一面,也有适应读者市场需求的复制、批量生产。这些创作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满足了文学市场的要求,也满足了当代文学资源构建的需求。显然,当代文学的消费有着明显的接受群体和消费层次。这些作品显然已经进入到了文学市场的新秩序之中,作为作者完全可以、甚至应该根据自我的内心进行创作,但作为作品却毫无疑问难以避免经受市场的选择。因此,这种现象是当代文学面向读者、面向市场的必然选择,是典型的当代文学市场化运作的产物。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代文学场域中,场域的边缘、边界扩展了,掌握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文学生产者”进入到场域之中,使文学场无形扩展,文学资本得以扩展。文学生产的资本化运作已经主宰了文化市场(除部分由政府部门投资、扶持的文化产品),它解构了一体性文化,培育了多元性文化,不仅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竞争,也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当然,也留下了诸多使人焦虑、被人诟病的问题。

四、当代文学资本化运作现象思考

经过产业化影响并不断调整的中国当代文学,毫无疑问具有了文学经济化、经济文学化的特点,文学融入到服务业、文化产业的大潮中。文学资源产业链的形成,推动了文学叙事和商业叙事的结

合,这种文学性的扩散,使得当代文学不再是简单的文本作品,而是包含了利用作品血缘要素的多样性产品。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破除了原本单一、固定的文学资源的所指内涵与外延框架,使大量的文本外文学资源进入到当代文学资源总库中,如从当代文学文本资源延伸的各种图像、音像、广告、游戏、动漫、玩偶,乃至旅游、作家纪念馆、文学馆等都已归属到当代文学资源的总库之中;另一方面,从学科研究的意义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空间扩大了,学科延伸、成长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资源的产业化与资本运作的合法化,调整了当代文学的生态,使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学科角度看,资本运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从而形成了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并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动因。当代文学经济、当代文学生产与生态、当代文学与跨媒介技术、当代文学符号、当代文学公共空间、当代文学影像学、当代文学与产业政策等等,都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的新范畴,原有的学科边界打破了。随之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宽度的拓展,最终使文学史研究增加了丰富的张力。

从当代文学的价值属性角度看,文学产品的精神诉求与商品规律之间的价值属性冲突,又终究使得对于文学作品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缺失的焦虑,社会效应与产业效应的不对等关系,一方面在促进文学、文化市场的繁荣,一方面又在侵蚀和消解文学作品的独立性与先锋性;一方面加速着文学市场的GDP增量,另一方面则又刻意回避着社会关怀与人文批判……文学的生命越来越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因此,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如何形成有效的良性互补,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似乎是一道两难的命题。追求和谐、平等、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构建“绿色、环保、低碳”的文学生产机制,协调和谐文学生产系统的各个要素,营造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实现商业利润与作品质量的良性循环,完成媒体批评体系的构建……或许才是在不可逆转的资本化过程中,当代文学十分重要的战略选择。

[责任编辑:平 啸]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apitalized Operation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Qian Xuchu

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of socialized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hange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ies, promoted by the need for culture diversity,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fter 1990s, has made great changes in terms of its production structure. The attitudes of writers, writing mode and types of resources have been transferring to marketization and literature works are being oper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market.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ome writers. Aesthetic standards are lowered and there is a trend of spoofing in literature works. Writers are turning into producer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ing of literature is stereotyped and readers are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In a sens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greatly enrich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Meanwhile, the pursuit of harmony, equality,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n creating literature works,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producing mechanism, the building of living space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te criticism system are the strategic choice we have to make in the unchangeable process of capita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sources; literature capital